

CHINA

2000
K270.6
21
2:4

红墙档案

档案
卷二

第四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3 0274 3996 1

CHINA

第四十章

千秋家国统一梦 台独涸流定成空

第一节 和平统一早公论 两岸本是同根生

“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已被宣布为中共 1950 年的主要任务。“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958 年 8 月间，迫于复杂国际政治背景的压力，毛泽东再次命令炮兵部队炮击金门。邓小平“一国两制”本来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八项主张中明确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

毛泽东提出对台工作新精神

一位西方学者这样说过：“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 10 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 50 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 10 多亿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战国埋藏的混乱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1949 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当蒋介石重新出任“总统”（代总统李宗仁拒绝赴台，逃往美国）时，中共领导人已经在策划进入南中国海的海南岛和上海东南的舟山群岛，并分别于 1950 年 4 月和 5 月占领上述两地。“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已被宣布为中共 1950 年的主要任务，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大将担任总指挥。1949 年 12 月，惶惶不安的蒋介石

任命受过美国教育的前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接替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并委任受过美国教育、曾指挥美训新 1 军在缅甸和东北作战，又在台湾任编练司令的孙立人将军为“陆军总司令”。

尽管 1950 年 6 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促使美国作出了长达 20 年的对台湾安全的保证，但和平统一的巨大洪流却从未因此而被阻隔，而且，更具有警世意义的是，李宗仁、吴国桢、陈诚、孙立人这些当年的国民党要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让信任他们的“总统”大失所望；李宗仁、吴国桢拒绝回台湾，陈诚遗嘱表示不愿违背民族大义、孙立人因不满蒋的独裁而遭终身囚禁，成为“张学良第二”……

诚然，对于生活在 20 世纪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中国的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1956 年，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是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既往不咎，可以回大陆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来去自由。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此时，我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方针已从“武力解决台湾”正式转为“和平解放台湾”，但也没有放弃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国民党派员赴京摸底

1956 年，中共中央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罗青长、凌云和童小鹏开展具体工作。同年 6 月 28 日，周总理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的口号，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7 月 16 日，周总理同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周总理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给台湾当局。

为了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意图，国民党遂于 1957 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会见了。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工作，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周恩来解释说：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归他们管。在这次接触中，中共首次表明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转为“和平统一”的方针，也是最早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然而，台湾当局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反应。

其时，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1958年，在美国的唆使下，国民党当局声称“反攻大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出动军队，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为粉碎“两个中国”的阴谋，是年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的矛盾，打击美国企图霸占台湾、让台湾蒋介石集团把台湾同大陆分开、划峡而治的阴谋。

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联蒋抵美”

针对美国的阴谋，我党对台方针有了重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联蒋抵美”。炮击金门时，毛泽东请章士钊先生写信约蒋介石，并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台湾。台湾当时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政府要求国民党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1958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把炮击金门的行动让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25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

章士钊担任两地信使

此时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都有私谊的章士钊先生从北京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平条件：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通机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方面对此和平条件表示冷淡。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指出，对台湾“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当时，虽然还停留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上，但实际上，毛泽东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进而和平统一祖国指明了方向。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11人时，曾经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又声明“反对托管台湾”，“反对搞两个中国”。“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1960年底，周恩来在与美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的访谈中指出愿意与美国谈判的同时，再次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的内政问题”。

1960年7月，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平信息。章赴港前的7月

17日晚住在北戴河寓所，周恩来与章士钊作了一次谈话。当时童小鹏在场。总理说，雷啸琴已回香港，吴铸人可能来香港（按：雷、吴都是台湾当局派出了解情况的人），会谈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还可以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有台湾之实（权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的一个小头而且迟早被美国换掉更好吗？但蒋大概是要等到同美国的矛盾爆发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的矛盾总是要爆发的。章士钊说：“是否可以把张岳军（即张群）作为一个对象来谈？”总理说：“张对这件事根本还未接触，目前还不适宜。”章提到对台湾写信问题，总理说：“他们如果要求的话可以写。”

周总理归纳对台政策为一纲四目，国共达成六项共识

1960年，根据毛泽东多次指示的精神，并经毛泽东审定，周恩来将中共的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或以从缓，等候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讲，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与台湾的关系。

1962年的一天，周恩来邀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给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

1962年至1963年，周恩来多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保护国，也不能搞两个中国”。周恩来几次谈话，都在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上，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

1965年，经过曹聚仁的沟通，国共两党进行了一次秘密谈判，并且初步达成了六项共识：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场所。（二）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和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的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款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的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可是，作为可作国共第三次合作基础的协定，却因大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蒋介石的刚愎自用而耽搁下来。

与台湾当局上层秘密联络工作，都是经过周恩来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通过国共两党高

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爱国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把中共和平解决台湾的信息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蒋介石利用中共宣布与台湾谈判的公开号召，派一些人员来大陆摸底。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这一时期，蒋介石通过各种名义和各种关系派了一些人到大陆，说要与中共高层接触。有一次派了四个人来，三个到北京，一个驻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其中一些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以假当真，假戏真做，心中有数。

陈诚遗嘱：不违背民族大义

陈诚将军戎马一生，历经几十年的政治和军事风云，60年代他身为国民党副总统，在台湾政界德高望重，被传闻认为是最有支持力和影响力的“接班人”，其主要竞争者就是当时台湾安全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蒋经国。陈诚和周恩来之间颇有交谊，对周的为人和才识也十分敬重。

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信。信中主要内容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不幸的是，1965年3月，68岁的陈诚病故。台湾报纸发表了他的遗嘱。

台湾当局高级官员当时一般的遗嘱，都要讲国民党的反共八股，包括两个方面：“反共”与“反攻大陆”。而陈诚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遗嘱一没有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我们通过有关途径反馈回来的消息得知，陈诚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陈诚遗书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高层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从陈诚的遗嘱看，我们对台湾当局高层进行通所、传话、传信的工作，是有效果、有影响的。

“代总统”李宗仁和“末代皇帝”相聚在北京

1965年，正当国共两党紧锣密鼓地谈判之际，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国民党朝野上下和国际政治家的大事，那就是“代总统”李宗仁回归祖国大陆，这是令蒋介石十分难堪的一幕历史讽刺剧。

1965年5月，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委派他的秘书程思远从香港秘密回国，向中央请示李宗仁先生回国事宜。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晤见程思远，请他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中央的“四可”原则，这“四可”是：一、李宗仁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程思远把“四可”原则原原本本地向李宗仁先生作了传达，李宗仁先生决心返回祖国定居。

周恩来在大寨时，程思远又受李宗仁先生之托，启程回国，最后一次安排李宗仁先生返国事宜。周恩来回京后，即安排会晤程思远，对李宗仁先生回国事宜作了仔细的安排。程思远非常感激，对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在美国经常翻阅溥仪先生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很受启发。纵观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把一位

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在新制度下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这充分证明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多么伟大。这也是李先生下定决心万里回归的重要原因。李先生很想尽早见到溥仪先生。”周恩来肯定地说:“你回去告诉李宗仁先生,他的这个愿望完全可以满足,我将动员溥仪先生到机场迎接你们。”

程思远见诸事已妥当,准备告辞,周恩来说:“为了保密,我不能送你。你们回返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台湾方面将对你们有所动作。我已指示有关部门配合你们。你们一定要按计划行动喽,绝对不能让李宗仁先生受到伤害。”程思远点点头:“总理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程思远走后,周恩来拿起电话,向有关部门下达了准备迎接李宗仁先生归国的命令。这些事办完了,周恩来又把秘书叫来,吩咐他说:“李宗仁先生马上就要回国了,他急于见到溥仪先生。但溥仪先生最近身体不好,你代我去看看他吧,听说他住院动了手术,请医院尽力想办法,恢复溥仪先生的健康。”秘书答应一声走了。

秘书来到医院,看到溥仪先生的夫人李淑贤女士在病床旁守护着,遂向他们转送了周恩来的问候。在此之前,溥仪夫妇已收到章行严老先生受毛泽东之托送来的一笔款子(毛泽东的稿费)。溥仪对中央领导的关心十分感动,请秘书代为向总理问候。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拘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方面于1950年7月把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战犯管理所。1959年9月,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令,对溥仪和国民党集团的战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清、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实行特赦。溥仪获得特赦后,毛泽东、周恩来数次接见,勉励他好好学习。溥仪觉得自己对故宫情况熟悉,要求到故宫当一名解说员,反省自己过去的腐朽生活和罪行,中央领导人没有同意,安排他到全国政协文史馆当专员,每月工资200元人民币。

溥仪特赦出狱后,他以前的几位皇后贵人早已四散而去,和他一同获释的将军周振强托人把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医院的护士李淑贤介绍给他,二人经过一段恋爱后,于1962年结婚,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参加婚礼,轰动一时。

溥仪结婚后,在李淑贤的帮助下,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总结,深刻反省自己在伪满洲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回顾了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生活和体会。全书生动地介绍了一个时刻梦想复辟的末代皇帝被共产党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的过程,披露了末代皇帝的清宫、伪满、战犯生活的许多鲜为人知事情,1964年正式出版后,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后来还被改编拍成了电影《末代皇帝》。

秘书回去,把溥仪的情形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你再去一趟医院,让医院绝对保证溥仪的休息。另外,你通知一下政协,给溥仪补助点钱。他们来往人多,又都有病,又都不怎么会过日子,单靠溥仪那点工资怎么够呢。”秘书答应着去了。

秘书走后,周恩来又由溥仪联想到李宗仁来,忽然,电话铃大响,周恩来听了几句,神色大变,吩咐说:“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国民党特务加害李宗仁先生。”他放下电话,不安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归国是件震动中外的大事,必将在政治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不能出半点差错。

那么,李宗仁先生到底碰上了什么危险呢?原来,他还没有从美国动身,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派出一批特务来美国,准备把李宗仁先生劫持去台湾。李宗仁先生回国乃是件极端秘密的事,李宗仁从政治军数十年,岂能不知其中的厉害。所以他把归国的安排工作只交给他的老友和部下称思远先生一人,外人概莫与闻。但是,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李宗仁先生在归国之前,经常发表声明,早已引起了美国和世界舆论的注意。李宗仁先生是否要回归祖国成为美国和香港报纸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香港报纸还数次报道过李宗仁已回归祖国的消息。这些消息虽然纯为子虚乌有,但已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

李宗仁先生是1949年12月从香港赴美治病的,原来还准备等白崇禧在军事上守住海南岛后回来视事。不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了个大大包抄,把白崇禧的主力部队歼灭于大陆,海南岛不久也被解放军解放。白崇禧被蒋介石许以国防部长之职骗入台湾,从此再不能出来。李宗仁只好在美国纽约当了寓公。旅美初期,蒋介石数次派出使团劝说李宗仁赴台,李宗仁知道去台湾后就会变成张学良第二,坚不赴台。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日增,程思远又受邀自港返京观光,所见所闻,令人鼓舞。李宗仁得知这些情况后,思想发生变化,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实为史无前例。中国百余年来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转折点。1958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声明,建议国共再度和谈。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要求美国正式发表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

以后,李宗仁又多次发表声明,呼吁促进祖国统一。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出版后,他仔细阅读,更受启发,甚至为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台湾当局看到李宗仁思想的变化,便加紧监视,数年下来,看李宗仁足不出户,门庭冷落,毫无回大陆的迹象,便放心了,他们也不相信代总统敢回大陆。

李宗仁从1964年以来,一直悄悄地准备着返回祖国。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美乘飞机去了瑞士。李宗仁走后,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委托律师出售新泽西州的一所房子。有人惊问她为什么卖掉房子,郭德洁回答说:“我身染重病,无力再照顾这所房子。卖掉它以后,我要去瑞士治病。”听者深以为然。原来郭德洁女士已患绝症多时,瑞士风光秀美,是治病疗养的好地方,郭德洁女士去那里治病是很自然的事。

两天以后,郭德洁女士离开纽约飞到瑞士,与李宗仁聚齐,等了几天,程思远由香港飞到苏黎世,与李宗仁会了面,告诉他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请他立即起飞。李宗仁因为还要等着约好的吴尚鹰一同走,迟迟不肯动身。程思远担心继续等下去会出问题。果然,到了7月11日,程思远接到一个秘密通知,要他们立即离开苏黎世,否则将遭杀身之祸。程思远赶紧报告了李宗仁,请他立即动身。李宗仁知道这个消息的份量,赶紧和程思远一起由亲戚陪着去了机场。李宗仁的亲戚刚回到住所,就见几个彪形大汉在门口守着,一见他回来就拿出一份电报说:“这是白健生先生给李德邻先生的电报,我们要亲自交给德邻先生。”那位亲戚抹了下头上的冷汗,不由得心里叫了声“好险”,对这几名老特说:“李德邻先生去罗马旅游去了,你们走吧。”这几名老特不相信,便说:“好吧,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从此,这几名老特严密地监视着李宗仁的这位亲戚,与他形影不离。

李宗仁离开苏黎世后，香港《快报》立即刊出消息“李宗仁将返大陆”。鉴于香港报纸以前放过几次空炮，世界各大通讯社都纷纷向台湾当局提出咨询。台湾当局一口否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鉴于台湾当局的特务系统向以消息灵通著称于世，世界传媒也都认为香港《快报》这次又放了空炮。李宗仁离开苏黎世后的去向成为舆论界猜测的有趣题目之一。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李宗仁的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

1965年7月20日上午，北京机场戒备森严，周恩来总理率彭真、郭沫若、贺楷、陈毅、罗瑞卿、徐冰、高崇民、许德珩、叶剑英、傅作义、蔡廷锴、溥仪、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黄绍竑、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及他们的夫人们一早就来到机场。今日将有一位历史性人物莅临北京，来迎接的人们兴奋地互相交谈着……且慢，范汉杰、廖耀湘不是在辽沈战役中被俘了吗？怎么他们也跑到北京机场来了，原来自1959年第一次特赦战犯后，1960年11月国家第二次行赦战犯，范汉杰、廖耀湘、沈醉等人就是在这次被特赦的。

将近11点时，从南边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大家不由得在骄阳下，手搭凉篷向南方的天际望去，只见蓝蓝的天际上出现了一个银色的亮点，不一会便变成了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飞机轰鸣着，向着跑道降了下来，一会儿就滑行到停机坪停下来。周恩来率欢迎人群向飞机走去。机舱门打开了，一个70多岁的老者出现在舱门口，只见他中等身材粗壮有力，一行一动都还带着军人的姿态。他是谁呢？正是前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桂系领袖，前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先生。

李宗仁站在机舱口，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还有贺龙、叶剑英……总而言之都是熟人。北伐期间，八年抗战，重庆谈判，大家一起共商国事，那该是让人多么振奋，那么留恋的岁月。可惜国民党不识时务，发动内战，以致生灵涂炭，最后被人民打败。李宗仁边想边向人群看过去，杜聿明、宋希濂……啊！他们也都来了。想起他们的战败被俘，自己也有责任，现在是认输的时候了。他向人们笑着挥手致意，快步从舷梯上走下来。周恩来紧走一步，握住李宗仁的手说：“德邻先生，我代表祖国欢迎你回国定居。”李宗仁激动地说：“周部长——啊，不，周总理，感谢政府对我的关怀。这位是我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周恩来和郭德洁女士握手，告诉她说：“你身体有病，要注意节劳，我已经在北京医院为您安排了病房，明天，你和德邻先生去检查一下身体。”郭德洁致谢说：“还在抗战时期，我就知道你体贴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心细。颖超大姐呢？”周恩来抱歉地说：“她早就准备要来机场接你们，结果临时有事要处理，不能来了。”

周恩来陪着李宗仁夫妇依次和元戎们见面，周恩来笑着说：“德邻先生，是不是还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李宗仁摇摇头说：“不要，都是老朋友了。啊，贺龙先生，还记得北伐途次的武昌战役吗？剑英先生，当年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幸亏你机智果断，率卫队营救出了中山先生。这不是沫若吗？我记得台儿庄战役后，你带队来慰问我，我还送你一张照片呢。”郭沫若说：“怎么不记得。台儿庄战役后，你在台儿庄车站的站牌下面，身着戎装，照相留念。我去慰问你时，你送我一张，我还在《洪波曲》中专门写了这件事呢。”大家回忆往事，不禁哈哈大笑，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周恩来这时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这里有一位朋友，你恐怕不太熟悉。我给你介绍一

下。”说着拉着李宗仁的手说：“这位就是溥仪先生。”啊！是末代皇帝！李宗仁紧紧地拉住溥仪的手，连说：“不错，不错。和《我的前半生》中的照片一模一样。溥仪先生，我们都当过你的子民呢。”溥仪笑着说：“我今年五十九岁了，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是认罪了。现在我真正成了一个自由公民，越活越年轻了。”李宗仁说：“你认罪，我认输。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认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我在美国读了你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对我很有启发。”溥仪说：“你认输，我认罪，都很好。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祖国的胜利，也是我和德邻先生后半生的胜利。”

接着李宗仁和杜聿明等人握手见面，大家自然又是一番感慨。周恩来怕李宗仁过于疲劳，便提议道：“同志们，先生们，我们要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德邻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回国定居，全国政协也要开茶话会，大家有的是时间畅叙离情。今天是不是先送德公去寓所休息？”大家听了一致同意。周恩来一招手，一辆三排座豪华大红旗轿车开过来，周恩来送李宗仁夫妇上了车后，招呼大家都上了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向市区开去。为欢迎李宗仁先生到来，北京街道上挂满了彩旗，一派节日气氛。

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李宗仁果真回了北京，十分恼怒，把保密局长毛人凤叫去训了一顿，临了吩咐道：“想个办法，不留痕迹地把那个人干掉。李宗仁既已投共，留着那个人也没什么用了。”毛人凤心领神会，周密部署，派行动组开始行动。

李宗仁回到北京定居，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欢迎，虽然还没有给予正式职务，但明摆着要荣膺重任的，起码，现在就已中央政府的高级顾问了。台湾很多军政要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都为之受到震动，其中白崇禧的心情更是复杂，充满了苦涩感。遥想1949年，自己因一念之差进了台湾，从此便被监视起来，没有一点自由，更不要说出岛访问了。每当李宗仁在美国发表批评台湾当局的声明或谈话时，蒋介石便授意白崇禧发表声明予以驳斥，白崇禧虽不愿意，但身不由己。现在李宗仁回了北京，他的按钮作用也完结了，说不定蒋介石就会要他的命。想到这里，白崇禧决定以后深居简出，处处小心。

但人总有七情六欲，自我禁闭的时间长了，总是有点烦闷，白崇禧便带着卫士去山里散步。他们在山里转了一回，便坐着木轨摇车往深山驶去。这木轨是专门设置的一种旅游轨道，旅游者可坐着木轨车顺山而下，驶往山里，从来没有出过事。白崇禧一行坐了两辆木轨车，木轨车顺山而下，风驰电掣，令人心胸畅快。不料前面的一辆车驶过一座桥时，桥忽然断裂，车子坠入河涧，摔得粉身碎骨。白崇禧坐在后面一辆，卫士急忙刹车，哪里能刹得住，卫士急了，一把把白崇禧推出车去，就在这一刹那间，车子驶上桥，坠入河涧。白崇禧爬起来望着山涧里摔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不由着浑身冒冷汗。他知道这是谁干的，如果他摔死了，明天台湾报纸上肯定会登上条消息，说他白崇禧由于桥身朽烂，死于意外事故。

从此，白崇禧更小心，很少出门，只和服侍他的护士张小姐在房里做爱。可是毕竟年大力衰，不得不吃补药，行动组见有机可乘，乃密令医生在补药上作文章，这补药果然有劲，白崇禧不禁高兴起来。可是有天，卫士们发现白崇禧的卧室久闭不开，撞开门一看，白崇禧已经是撒手西去。医生们闻讯检验尸体，都只认为是用力过度之故，而都不知道是补药作怪。

周恩来为白崇禧误入台湾，导致严重后果深为可惜。有一次和李宗仁谈起往事，说起了白崇禧，周恩来说：“健公号称小诸葛，但他就没有把蒋看透。1949年他的老本都已在战场上

打光了,蒋一再请他去台湾,还能有什么好事吗?”李宗仁叹息一声说:“是啊,当年我和思远都劝过他,他就是不听。自食其果。”

李宗仁回国定居快半年了,心情愉快,成天忙于接待各方人士,但他却没有注意到,郭德洁女士的病由于兴奋和参观访问劳累而转重了,终于在医院里一倒不起,于此年年底辞世。李宗仁十分悲痛,周恩来亲自料理丧事,安慰李宗仁。

数年以后,李宗仁先生在北京病逝,终于如愿以偿地长眠于祖国的大地,所幸的是,他的好友和后继程思远先生,却至今仍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实现他终生的夙愿而奔走呼号!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魂系祖国

如果说李宗仁脱离蒋介石政权,只是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话,那么,吴国桢,这位蒋到台湾后亲自扶持的领导人,发展到公开与蒋决裂,则绝非历史的偶然。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台湾问题就变得异常突出。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劝阻,想冒险“反攻大陆”,引起美台矛盾十分尖锐。在台湾岛内,蒋介石极力排斥、打击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政治力量。1953年1月,受美国支持的吴国桢被迫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以后又被撤销“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及开除国民党党籍。同年11月,与吴国桢关系密切的“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被蒋介石免职。1955年8月,台湾局以“兵变”和“颠覆政府”罪免去留美的国民党将领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务。

吴国桢在民国时期先后担任过“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1949年12月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旋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53年4月辞去台省“主席”之职,5月离台飞美。

吴氏去美不久,台湾即以盛传他套取巨额外汇为导火线,掀起一场风波,致其在美国登载“辟谣启事”,连续发表激烈抨击台湾当局的言论,把他与蒋氏父子之间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这便是轰动台湾的“吴国桢事件”。1954年3月,台湾当局宣布撤销吴国桢“行政院政务委员”之职,并永远开除其国民党党籍。

吴国桢的晚年在美国大西洋边的古城萨凡纳度过。他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著书立说,其英文史学著作《中国传统》和英文小说《永静巷》,曾风行美国。

经历过巨大创痛的吴国桢,仍然密切注视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在70年代,中国先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

1982年,吴的长婿俞益元从国内带回一张吴国桢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结拜兄弟的照片,吴氏凝视亡龙英姿,忆及当年的兄弟情谊,不胜哀痛,百感交集,遂挥笔题词: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1983年2月，吴国桢将此珍贵的照片翻拍后，连同题词，转赠南开老同学、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市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杜建时。信中，吴氏回顾了当年他与周恩来结拜“把兄弟”，以及共同学习，亲切交往的情景。言词之间，怀国思乡，情深意切。

杜建时迅速将照片和信件交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拯民转呈邓颖超同志，邓颖超阅后交廖承志副委员长阅处。廖承志决定，由他出面邀请吴国桢回国观光。这一消息仍由杜建时写信转告吴国桢。

远隔重洋的吴国桢获此信息后，感动不已。他在信中写道：

“这数年来，弟常得各方友好通信，鼓励催促，回国一游。弟皆避而不答，或敷衍了事。然兄与承志先生此次正式邀请，隆情厚意，非比寻常。弟思之逾旬，若依例葫芦，假辞推托，则不独有失‘君子相见以诚’之道，且人以国士视我，我岂不可以国士报之。”

“更有进言者，假使吾兄此次来函与承志先生邀请在半年以前发生，弟亦不敢肯定本身答复能有如此之深切。所以然者，盖以弟对中国前途失望，其年数几与在美时间相等。绝望之后，忽显曙光，恰在此半年间，弟对邓小平先生之措施，无论大小，莫不留心；……但对年来施政大纲，实感所见相同。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曲不折，既周且澈，一代坚持，一代继行，不出二代，中华神州当可成为二十一世纪中世界上最富强康乐之一国。弟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

但是，吴国桢对于回国观光，仍有一定的顾虑。他决定先派其长子、美国亚拉马巴州立大学教授吴修广和长媳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凯瑟·玲·约翰逊，先到大陆访问，他在给杜建时的信中说：“弟意若能由吾兄转陈承志先生商洽一下适宜机构向其夫妇作一适当邀请，回国观光，弟当囑其遵命不误，事若果行，到时敬谒吾兄，请求指教，自在企盼之中。若承志先生及其他当局能于公余抽暇进而教之，不独增进其对国家之认识，使其受益不浅，且可令其返美向弟表述一工，以为弟行止决定之一助。”

吴国桢的来信和要求，迅由杨拯民副秘书长转呈廖承志副委员长。廖承志当即批示：由北京大学邀请吴修广夫妇来华讲学。

不料，正当此事在廖承志主持下顺利进行之际，廖承志副委员长突然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于6月10日与世长辞。吴国桢闻讯，即自大洋彼岸来函，深切致哀。

廖承志逝世后，所遗吴国桢亲属来祖国大陆访问事，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负责处理。

9月初，北京大学邀请吴修广夫妇回国讲学的具体安排已定，遂由杜建时详细函告，并寄去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册，使其进一步了解祖国大陆情况与党的方针政策。

10月中旬，吴国桢夫妇在结束了两个月的欧洲之行，飞返萨凡纳寓所后，接获先期寄达的杜建时的来信与《邓小平文选》。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阅读了《邓小平文选》。

吴国桢在回信中告诉杜建时，修广夫妇定于12月15日启程，16日可到达北京。

12月16日午夜,吴修广夫妇顺利抵达北京。杜建时与夫人李念淑去机场迎接。北京大学负责接待,安排吴修广夫妇讲学,并陪同他们游览了长城、颐和园等京城风景名胜。在此期间,因病正在休息治疗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委托平杰三副部长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吴修广夫妇。接着,杜建时夫妇又邀请他们去家中作客。吴修广夫妇表示对于国家所给予的热情款待,深感满意,并转达了父亲吴国桢对杜建时夫妇的问候;同时详细询问了杜氏的工作、生活情况。杜建时告诉吴修广夫妇:国内形势和政策都很好;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已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她对吴国桢先生是了解的,也很关心。杜再次诚恳地希望吴国桢先生能在短期内回国观光。以叙旧谊。后来,吴修广夫妇又由政府安排,参观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城市。

吴修广夫妇到美国后,向吴国桢报告了来自祖国大陆的最新信息,进一步增进了吴国桢对祖国的了解和感情。不久,吴国桢即于1984年1月16日致函杜建时,信中说:“修广夫妇到北京时,时值午夜,乃蒙兄嫂亲往关照。修广夫妇一月五日返美,虽以冗事及学校开学,未能来沙城(按即萨凡纳)聚会;但在电话中业已畅谈多次,并将其在国内时友人所赠书件寄来,故对其在各地观光,厚承招待之情形,知之甚详。修广夫妇当分别函谢,弟谨专诚向兄嫂致铭感之忱。”

在此基础上,杨静仁准备再次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杨静仁将这一想法同邓颖超商量时,邓颖超表示完全同意,并说:“吴国桢先生归来,应由我来出面邀请。吴国桢夫妇年事已高,归来时应由子女陪同,以便路途照料。”遂决定由邓颖超、杨静仁联名邀请吴国桢夫妇携子女回国观光。

这一信息,仍通过杜建时去信转达。吴国桢接信后,立即作复。信称:

修广夫妇归后,盛称祖国进步状况,及其接受隆重招待情形,不胜感谢,顷又得来函,示知邓颖超主席与杨静仁部长殷勤邀请,回国观光,邓主席更亲嘱带儿女同来,以便随侍。雅意深情,中民主铭感。弟虽已八十,尚称顽健,惟内子身体素弱,对于万里飞行,未免心怯。且近患骨炎及胃病,延医诊治,稍见效果,一时更不敢远离医生。请代向邓主席及杨部长敬致谢忱。

吴国桢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邀请所受感动,已跃然纸上,只是因夫人黄卓群的健康原因,而不能立即成行。据此,杜建时又去一信,建议:“若兄欲归国观光心切,而因夫人有恙尚难成行,可否着夫人暂且养病,您由子女陪同返里,争取新中国国庆大典35周年纪念日前抵达北京。”这一建议,与吴国桢的想法正相吻合,他提笔复函:“于兄意见甚好,弟拟照办,刻已有此准备。”吴国桢决定于9月份,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之际,回到阔别30余载的祖国大陆。

5月,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了六届二次会议,邓颖超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杜建时,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列席了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会后,他随即将会议关于发扬民主传统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主张,写信告诉吴国桢,俾其在归国前夕,对于祖国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在吴、杜二人为吴氏归国观光事书信往返期间,吴国桢于3月17日、18日两天,接受了著名作家江南的采访。进行了12小时的长谈,吴国桢尖锐地批评了“台独”的观点,他强调:

“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独立没有前途。”他认为：中国倡导“讲信修睦”、“和为贵”，所以故宫的主要建筑物，命名为太和殿、保和殿，一切在“和”的前提下前进。西方过分重视权利，忽视责任，在一部字典里，没有一个“让”字，中国人具有忍让的美德。他还根据新近从各方面获得的感受，兴致勃勃地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

可惜，吴国桢竟未能读到杜建时那封将会令他更为鼓舞的信件。正当北京积极在筹划如何盛情接待这位海外游子的时候，82岁的吴国桢先生，于6月6日突然在美国萨凡纳城的寓所病逝。噩耗传来，使吴氏生前的同学、朋友以及他供职地方的人们，深感惋惜和哀痛。上海市长汪道涵致电吴夫人黄卓群女士及其子女，对吴国桢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邓颖超、杜建时等，亦以南开校友的身份，致电吴氏遗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暮年陈立夫：道出台国民党老人的心愿

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已经远离政治中心，但他和其他元老们却为两岸关系专给李登辉上了一本。

1988年7月14日，在国民党十三大闭会后的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陈立夫以及包括蒋纬国在内的34位国民党中评委联署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了一项议案，即《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互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该提案的基本内容有：

(1)中共应放弃四个坚持和武力犯台，并对中国共产党拒绝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表示惋惜。

(2)深信中国的统一是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的共同愿望，只是时间问题。但统一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努力达成，其方式是以文化与经济，而非武力，亦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

(3)“欲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

(4)复兴中华文化，“以伦理、民主、科学为纲，重振四维八德”，中共用四个坚持来凝聚全民，其力量要大千万倍。这既为大陆人民额手称庆，也与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趋于同一方向而合流，如此进行，和平统一之门必将自然开启。

(5)“和平之门一开，则可进一步走向经济互惠之途，台湾之财经科技的潜力，与在陆之人力资源，合为互惠之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合力谋划国父实业计划之实施”。这样，一则可以协助大陆人民解决经济困难，二则可以奠定21世纪为中国人的世纪的经济初基。

(6)如果中共愿与国民党开诚合作，以平等及和平方式谋求中国自由、民主、均富与统一，从文化、经济两方面率先实现，那么国民党愿意向大陆提供50~100亿美元之外汇资金，作分年长期低利贷款之数。

(7)“苟能如此进行，则共信互信，自能建立，双方在各方面之敌对行为全部去除，进而作

次一步政治整合之协商,根据总理‘和平、奋斗、救中国’之大方针,逐步进行,则和平统一,乃为必须之结果也。”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历来以党务专家、教育专家著称,旧中国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政治歌谣,可见其当时的势力。1949年逃到台湾以后,陈立夫像其他国民党元老一样受到排挤,远离政治中心,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化。陈立夫与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一样,盼望祖国能够实现和平统一。他虽一再声称不再问政,但对中国统一,他一直抱有期待和使命感,排斥分离的意识和倾向。陈立夫在国民党“十三大”开会前就兴致勃勃地自撰了这个3000多字的经济援大陆的方案,从中国文化的四维八德讲到海峡两岸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亲自一一找人闻署。在中评委员会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便发。

陈立夫经援大陆的主张一提出,台湾朝野为之震动,“立夫案”成为热闹话题,陈立夫等人顿时成了风云人物。台湾东吴大学经济系一教授对陈立夫等的行动表示钦佩,并称之为“可喜的思想转变”。台湾一家杂志在《反共老人在做联共先锋?》的评论中说:“这位公众形象里长年满口孔孟,‘道贵’高中中国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子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让国民党中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确实,身为国民党三朝元老的陈立夫提出如此提案,很出乎人们意料,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代表着国民党众多元老盼统一的潮流,这也许是他为完成宿愿的最后一搏。

台湾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昭明在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表示赞赏的同时,指出台当局可比照经援东南亚国家的办法帮助大陆改善公共建设。大陆同胞对陈立夫等34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表示充分肯定。9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对陈立夫提案作了积极的评论,认为这一提案尽管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是令人感佩的。表示国共两党“只要谈起来,一切问题都好商量,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国共两党可率先就和平统一达成谅解,提出和平统一的方案,与国人共商”;“凡是为促进祖国统一提出积极、合理的主张和建议者,我们都表示欢迎,并愿意与之协商合作”。并表示希望两岸能在经济、文化方面开始实行合作,并愿就此问题与台湾方面在大陆、台湾或其他地方早日进行协商。

陈立夫等人提议以50至1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大陆,显然与台当局的三不政策相背离,因而遭到保守人士及当权人物的反对。就在7月14日的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上,中评委上官业佑即当场指出:这次提案与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完全相反”,作为口头犹可,但决不能付诸实施。李登辉在7月底接见台立委环球考察团时,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也予以否定。

尽管陈立夫提案未能付诸实现,但提案本身的意义,它对台湾当局的保守心态造成的冲击以及对台湾社会所造成的心理震撼,都是不可忽视的。这项提案还表明了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连一向被称为保守的国民党元老也开始寻找增进共识、促进和平统一的有铲渠道。1988年8月20日,陈立夫在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表示,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地位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他说,他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这不仅是陈立夫个人的心愿,也是许多国民党元老的共同愿望。